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斯 大 林

#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И. СТАЛИН  
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根据 1953 年俄文版译出

斯 大 林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 大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机 械 工 业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1971 年 10 月 第 1 版  
1971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624 每 册 0.14 元

## 目 录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	3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	27
答同志们 .....	33
译者注释 .....	43

#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sup>1</sup>

蘇同舉言耐味又佳想其品

##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刊上就语言学问题，特别是就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意见。我不是语言学家，当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同志。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同意回答这些同志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sup>①</sup>。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做例子来说吧。最近三十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

---

<sup>①</sup> 原文为 «учреждение», 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补充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许多词和语获得了新的含意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末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



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服务得很好。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阿尔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莫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捷尔拜疆语、巴什基里亚语、土尔克明尼亚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统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语<sup>2</sup>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

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次，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末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意思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重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为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有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象通常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

“山”、“森林”、“鱼”、“人”、“走路”、“作事”、“生产”、“做生意”等等不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语句中的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存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改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作什么重大的改革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在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末这样的语言改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能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象唐·吉诃德<sup>3</sup>之类的人以外，谁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是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

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新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对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都应当了解为阶级,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sup>①</sup>语言,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sup>②</sup>语言,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sup>4</sup>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

---

① 原文为«народность»,系指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以往曾译为“部族”,现改译为“民族”。——译者注

② 原文为«нация»,系指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译者注

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对对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主导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术语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阶级的”习惯语、同行语、沙龙“语言”<sup>5</sup>。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有“贵族语

言”、“资产阶级语言”，有对立的“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习惯语和同行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的只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抛去了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词，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习惯语和同行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习惯语和同行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那里有一处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sup>①</sup>，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的“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sup>6</sup>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55页。——译者注

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sup>①</sup>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服从于高级形式。

那末，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惯用语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的生意人的同行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sup>②</sup>。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的“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习惯语，他完全懂得，习惯语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习惯语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的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风尚、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惯、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00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2卷第410页。——译者注

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辩护语言的“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sup>7</sup>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同行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不是讨论语言和同行语的区别问题，他把习惯语有时叫做“人为语”，有时叫做“同行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贵族所擅长的人为语……是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习惯语和同行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辩护语言的“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官邸中不大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以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间”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



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末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末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末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就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难为情，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